

从五十春秋一颗心 陈浩凯

当我在印尼西加里曼丹坤甸读完初中时,父亲要我就业从商,不再继续提供我生活和学习的费用,而我则硬着头皮毅然走上继续念高中的道路。同学们鼓励我,并为我在雅加达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一份工作,我下定决心,满心欢喜和同学们一道踏上新的征途。

到了雅加达,考上了全印尼著名华校巴城中学,每天上午学习,下午同学们课外活动,我则打工,晚上复习功课;日复一日,半年下来,有些疲惫不堪,虽说学习成绩不错,但一个子儿也没挣着。老板解释说:“你是学徒工,没收你的学费就够照顾的了!”第二学期我不打工了。我父亲看我学习的决心很大,且成绩不错,他说“念你一足之伤”,答应供我继续上学的费用。这样,我总算能有和同学一样的就学机会。

1951年初,新中国成立一年多,长期历经战争磨难的祖国,百废

待举。海外青年学子满腔热血,一心向往祖国,渴望投身祖国经济建设。一时间,“回国升学”成了当时的热潮和时尚,成百上千学生组成回国学习团,涌向亲爱祖国的大地。我同许多同学一样,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,毅然登上回国的万吨巨轮北上。第二次升学的抉择,我义无反顾直奔祖国首都北京,考上了北京育英中学,享受助学金。1952年入团,1953年入党,同年考上全国著名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筑学专业,全年级只我一个候补党员,义不容辞地要承担各种政治工作任务。团支部书记、党支部书记、政治辅导员各种“头衔”加到我的头上,成了清华大学特产-双肩挑干部”(边学习边工作),6年下来,经过建筑学专业训练,毕业了,照常规应是从事建筑设计或教学科研工作,这也是我多年祈盼报效祖国的工作。这次不是我自己下决心选择了,而是“工作选择了我”!留校工作第二年,被

调去搞宣传工作,学摄影,写文章,编画册等,干了好几年,一直到“文革”。后来到江西鲤鱼洲的农场劳动,“接受再教育”三年。回校又当了音乐室主任,兼任建筑系的美术课和摄影课教师……可以说是“党叫干啥就干啥”。

1984年我被派到烟台市新成立的烟台大学参加创业,担任烟台大学建筑系副主任。这是大学毕业以来真正回到老本行,从事建筑专业的管理与教学工作。

烟台是沿海改革开放的中等城市,中等教育很普及,水平较高,却没有高等学校。这里空气新鲜湿润,蓝天碧水,风景宜人;农业发达,盛产水果海产。我来到烟台,就仿佛回到了海外故乡坤甸一样亲切。

烟台大学由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口支援,委派教授担任各系主任、副主任,许多主要课程由两校派教师授课,由两校办研究生班代培烟台大的后备师资力量,如同两校合办的“分校”,因此发展迅速,成绩显著。

我们这些由北大、清华借调来的各系负责人,绝大部分都不带家眷,除了寒暑假回京外,常年在烟大,全身心扑在艰苦创业上,被昵称为“快乐的单身汉”。

创业初期,师资短缺,建筑系尤甚。由于建筑学人才在社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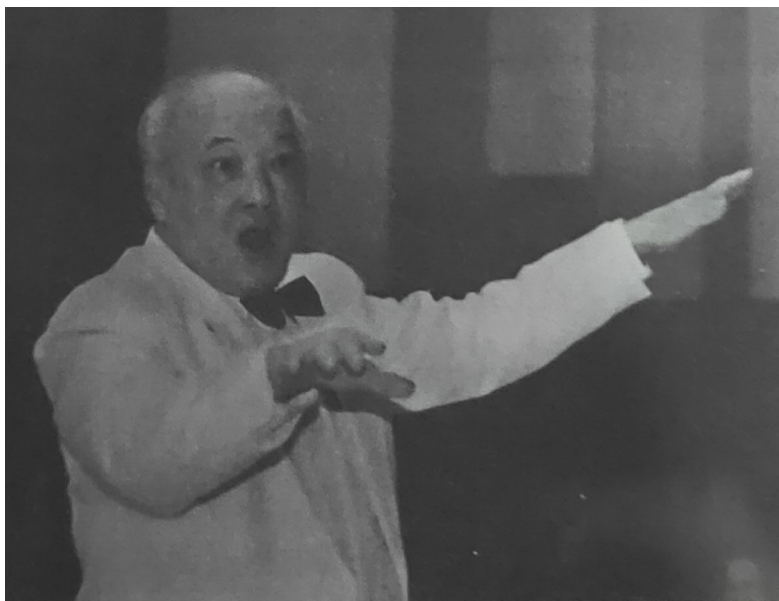


1951年6月,回国前夕摄于雅加达

上很吃香,搞建筑设计比搞教学收入高得多,要想从全国重点大学和社会招聘教师,太难了。只能从东北、西北两方面物色人才。我千方百计从师兄弟姐妹中动员。1985年,有了七、八名教师,校舍建起来了就开张。建筑系只招一个班,30来个学生。我除了系主任工作,还兼任烟台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,参加美术课、建筑设计和西方建筑史的授课与辅导。其次,新建校的专业图书、资料匮乏,特别是建筑学专业书。一方面从清华收罗多余的旧图书,接受无偿捐赠,另一方面集中有限资金购置最新国内外专业图书资料。艰苦奋斗了5个春秋,第一届本科生毕业了为山东省培养出第一批建筑专业人才,第一次享受到辛勤

耕耘后丰收的喜悦。这第一批毕业生很快成了建筑设计行业的骨干,有的还成了各级专业领导骨干。如今的烟台大学,经历了整整20年的艰苦奋斗,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省重点大学。现在建筑学专业本科生400多名,教职工46名,现任系主任就是烟台大学自己的第一届毕业生郝曙光。看到了这些成绩,怎能不教人感到欢欣鼓舞呢!

1990年,清华、北大支援人员全撤回本校,我回到清华被任命为建筑学院的《世界建筑》杂志社副社长兼编辑直到退休。退休后,操起老年业余合唱团的指挥棒,人们戏称我是“合唱指挥专业户”。晚年能为老年朋友服务,“不亦乐乎。”



合唱团指挥